

Dongbeiyahaiyangshengwu
ziyuanzichanhuaguanliyuhezuooyanjiu

朴英爱 著



东北亚海洋生物 资源资产化管理与合作研究

——以中日韩为中心



吉林大学出版社

Dongbeiyahaiyangshengwu
ziyuanzichanhuaguanliyuhezuoyanjiu



东北亚海洋生物 资源资产化管理与合作研究

以中日韩为中心

朴英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亚海洋生物资源产业化管理与合作研究：以中日韩为中心 / 朴英爱著. —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 - 7 - 5601 - 4045 - 2

I. 东… II. 朴… III. 海洋生物资源—资源管理—研究—东北亚 IV. P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1243 号

书 名：东北亚海洋生物资源产业化管理与合作研究——以中日韩为中心
作 者：朴英爱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冠宏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20.37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4045 - 2

封面设计：孙明晓
长春大学印刷厂 印刷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8499826
网 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贯穿人类社会始终。从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开始,自然资源就一直为经济学家所研究,它们被看做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而森林、渔业资源和农业用地等资源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是因为它们是食物供应的重要基础。^①直到近期,自然资源领域的主要理论才发展起来,并把森林、渔业资源被看成可再生资源。这些资源正以有限的速率进行自我更新,而这一速率取决于各个时间段资源存量的大小以及人类影响存量变动的程度和性质。考虑自然资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其固有的跨学科性。生物学和生态学上的群体动态的概念与可再生资源理论中的经济学概念紧密相关,物理学上的物质平衡概念是环境经济理论的基础,产权和所有权的法律概念极大地影响了环境经济学的分析。

从资源的最终使用者——人类的角度看,自然生物种群最容易被看做能提供潜在服务的资本存量,因此,确定如何实现资源利用的收益最大化,就成为一个资本理论的问题,即主要确定各个时断如何组合资本存量。这个观点承认对自然资源的“善意的”利用,也就是使系统保持在接近于“自然的状态”。

现代资本理论的根本问题是资本存量在时间上的最佳利用问题。生物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明显符合资本存量的耐久性和迟滞性关键特性。就生物体、种群、物种而言,它们是耐久的,此外,由于所有种群的增长率受到固有的种群生物学特性的限制,它们不会快速和无成本地增加。

海洋生物资源作为可再生的资源,具有自行繁殖的能力,通过产卵—孵化—稚鱼—幼鱼—成鱼—产卵等繁殖、发育和生长的过程,进行生物性再生产,种群数量不断获得补充,并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使种群的数量在一

^① [美] 阿兰·V·尼斯,詹姆斯·L·斯威尼,李晓西,史培军译:《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页。

定点上达到平衡。如果环境条件适宜,人类开发利用合理,它可世代繁衍,持续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但它也依赖外部太阳能所产生的基础生产力才能进行再生产,如果生长环境条件遭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或遭到人类的酷捕滥捕,自我更新能力就会降低,资源减少到一定水平以下,就会失去再生能力,将会导致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枯竭。如果人类的管理不善,海洋生物资源就会和矿物资源一样成为枯竭性资源。一直以来生物学家和水产学家们不断研究阻止海洋生物资源枯竭,并从海洋中获得可持续性的最大捕捞量的方法。

关于海洋生物资源的财产所有权问题,许多人曾经试图予以解决,但很少成功,也不能在大规模范围内进行试探。其原因是大多数鱼类具有洄游性和流动性特点,并且有很广泛的洄游范围,因而限定鱼群洄游范围并宣布这类鱼群属于私有的可能性极小。正因为鱼类跨越各国边界,人们无法将它们限定在某一范围,不能用区划来设定其产权,使得鱼类资源的财产所有权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所有对财产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最基本的依据是由法律机构或国家权力机构制定的强制措施。除了那些稳定的渔业资源,要解决暂时停留在某一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鱼类的财产所有权问题,可能是不现实和不合适的。

一般情况下,在某一水域中,对于某一种海洋生物资源,常常是几个国家或地区共同开发利用。也就是说海洋生物资源是属于典型的共享性资源,即任何人都有权力捕捞它们。设立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前,任何人无论其国籍如何,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捕捞活动。但 1982 年签署、199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不仅确立了各种海域的法律地位和制度,而且建立了有关海洋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法律框架。《公约》将浩瀚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并适用相应的法律制度。在《公约》制度下,沿海国对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等所管辖的海域作为国土来管理和开发。特别是,《公约》赋予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提出了资源及渔业管理的核心标准,包括海洋划界、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的权利和地位、剩余资源量(surplus resource stocks)、跨界往来资源(straddling fish stocks)、高度洄游资源(highly migratory)、总允许渔获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作为决定 TAC 的标准,对最大持续渔获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s; MSY)下了生物学和经济学定义。《公约》还明确规定沿海国可

以采取养护和管理某些洄游鱼类种群的特殊措施,包括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溯河产卵种群、降河产卵鱼种及海洋哺乳动物在内的洄游鱼类种群。洄游鱼类种群是指那些在不同水域内进行长距离周期性洄游的鱼类,它们不但在各国 EEZ 之间,还在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之间洄游。有些种群在大洋中产卵,随后游到沿岸水域生活度过成熟期,有些则是在岸边或浅水中繁殖,随后游到远海中。显然,鱼类活动不受人为划定的海域界限的影响,它们的洄游特性使单个国家对其进行的管理变得无效。

《公约》63 条和 64 条为解决洄游鱼类的养护和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个大体框架,即沿海国和捕捞国应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达成协议,进行合作,但对于具体如何管理这类种群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规定,仅仅要求相关国家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设法”就必要措施达成协议,协调并确保这些种群的养护和发展。倘若国家间就共享资源的管理问题没有达成合作协议,各国将依据本国的法律和政策进行管理,当一国采取严格的养护措施而其他国家对种群进行大肆捕捞,最终会导致资源得不到恢复,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合理。所以,洄游鱼类种群使有关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管理挑战。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形成新海洋秩序的区域。中国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黄海、东海是半闭海,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半闭海往往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生活于其中的生物不同于其他海洋生态系统。东北亚地区由于气候风土上不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再加上虽然黄海、东海等海域面积小,但是基础生产力丰富的世界渔场,洄游、栖息在黄海、东海等海域的鱼种多种多样。因此,东北亚周边国家都把水产品作为重要的蛋白质供应源来开发利用的,相应地这一地区渔业和渔业技术相当发达,具备了发展渔业的良好条件。由于东北亚各国都比较偏好水产品的消费,渔业成为各国的重要产业。各国所利用的渔场、喜欢的鱼种、渔具渔法也很类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通过双边渔业协定,形成了国际渔业关系,维持了此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秩序,但围绕渔业的纠纷一直没有中断,有时还演变成政治问题。虽然国家渔业关系应在整体海洋法秩序的框架内形成,但渔业管辖权问题不能不受国际政治环境的直接影响。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在那里集中着大国的利害关系,在它们的作用下,处于分断状态。同时,中韩之间由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直到

1992 年建交之前, 相互之间不承认其国家地位。因此, 东北亚地区无法建立国际渔业秩序, 渔场或渔业资源的国际管理问题, 实际上处于放置状态。

相对于对共享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黄东海周边国家更关注其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食物供应的保障。1990 年以后, 世界范围内渔业产量第一位的中国, 第五位以内的日本, 第十位以内的俄罗斯和韩国就是这个海域的沿海国。其中,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和消费国, 中国是渔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是被看成二战以后最典型的远洋渔业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 日本以强大的海洋力量为后盾支配了这一地区。这样, 各国的海洋管辖政策首先是从对日防御的角度实施的, 所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渔业关系也是以日本为中心形成的。可是, 随着近年来韩国和中国渔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渔业规模的扩大, 这些国家国民的渔业活动范围由沿岸渔场急剧地扩大到近海渔场, 并由于他们的竞争性作业, 带来了渔业资源的减少和衰退。

再加上, 由于政治, 经济领域的特殊历史关系, 一直以来, 中日韩三国对此渔场栖息的、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种, 几乎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下, 相互之间进行了竞争性开发和利用, 渔业资源的保存方面缺乏应有的合作。结果造成了渔业资源的日益衰退, 资源向低营养级、短生命周期的方向转化, 导致渔获物整体质量的下降。这意味着处于食物链上层的种类已经完全捕捞, 渔民当前的捕捞对象则是处于食物链下层的种类。与此同时, 渔业资源种类也不如从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大黄花鱼、小黄花鱼和带鱼等主要捕捞品种已经呈现毁灭性的衰退, 即使没有达到灭绝的地步, 也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生产水平。原有的资源结构、生态平衡不断遭到破坏, 恢复使经济价值高的资源处于良性循环、资源总体能保持较佳的品种结构并相对稳定, 难度很大。

《公约》生效以后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东北亚沿海国分别在 1996 年的不同月份和 1997 年批准了《公约》, 这对东北亚公海自由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国际海洋秩序带来了巨大变革, 新海洋秩序在东北亚地区已基本形成并逐步完善。东北亚各国通过双边协定的形式建立了专属经济区体制下的渔业秩序, 对不重叠的专属经济区确定为沿海国各自固有的 EEZ, 对重叠的水域设定了暂定措施水域或中间水域。但该海域大多数洄游鱼类种群跨越边界自由洄游, 其洄游路线与人为划定的政治疆界是毫无关系, 不受海域边界的限制。与金枪鱼及大部分鲸类, 具有高度洄游特性, 能够在广阔的海

进行长距离洄游不同，黄海和东海的洄游鱼类大体上形成了完整的洄游范围，常年栖居于该海域，作为土著种度过一生。其洄游活动主要发生在自己的生态系统内，而这些生态系统所在地包括黄海和东海周边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这些鱼类中主要种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分布于西部沿海，冬季来临，它们从黄海洄游到东海的中部和东部边缘。总体上，这些海域的鱼类种群生活在周边国家共同分享的“公共池塘”（Common Pool）。因此，对这种资源必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内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管理，每个国家有义务通过地区水产机构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调整保存和开发跨界往来渔业资源的活动，任何单方面的渔业管理措施都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没有国际合作，不仅解决不了生物资源的保存问题，也不能解决环境的保全问题。为此，开发这些资源的国家必须具有共同的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共同管理，如果不具备健全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的话很难成功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要建立以广泛信任为基础的管理东北亚海洋生物资源的区域性渔业管理机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1
第二节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23
第四节 国外海洋生物资源资产化管理理论与实践	29
第二章 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36
第一节 海洋生物资源及特性	38
第二节 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变动的基本模型	42
第三节 自由和管理捕捞业的生物经济学均衡	53
第四节 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的标准和方法	62
第三章 《公约》与海洋生物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78
第一节 海洋自由原则和传统海洋秩序	78
第二节 《公约》与新海洋秩序的形成	82
第三节 专属经济区制度与海洋生物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92
第四节 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	103
第五节 东北亚地区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	108
第六节 中国海洋生物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119
第四章 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政策比较	126
第一节 中日韩海洋生物管理政策的总体比较	126
第二节 中国的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政策	132
第三节 日本的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政策	143

第四节	韩国的海洋生物管理政策·····	147
第五章	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关系·····	158
第一节	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关系的特征·····	158
第二节	中日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关系·····	161
第三节	中韩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关系·····	168
第四节	日韩洄游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关系·····	176
第五节	中日韩渔业协定的比较·····	182
第六章	构筑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共同管理体制·····	193
第一节	海洋生物资源共同管理的理论基础·····	195
第二节	海洋生物资源共同管理案例分析·····	204
第三节	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共同管理的现状·····	217
第四节	中日韩海洋生物资源共同管理方案·····	222
结束语	·····	231
参考文献	·····	233
附 录	·····	238
后 记	·····	31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一、自然资源的概念

从汉语词义看,“资”泛指金钱、财富;“源”指来源或源泉,资源被解释为“资财的来源”。传统的“资源”概念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

在经济学中,资源概念的内涵相当广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均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广义资源指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一切能够形成、制造、带来或转化为财富的东西,它在原先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既包括一切人类所需要的自然物,如植物、动物、土壤、矿产、空气、阳光、水等,也包括以人类劳动产品形式出现的一切有用物,如房屋、设备、消费性及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包括各种无形资源,如信息、知识和技术,以及人类本身的体力和智力等。

但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资源的概念在内涵上要窄一些,或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定的,一般是指自然资源。到目前为止,关于自然资源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由于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角度、研究的目的的不同,其定义也不同,自然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也发生变化。

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它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一般是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自然界的任何部分,包括土壤、水、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矿产等,凡是人们可以利用来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物

质都可称为自然资源。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的定义为:“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及生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和功能,前者为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生物及其积聚的森林、草场、矿床、陆地与海洋等,后者为太阳能、地球物理的循环机能(气象、海洋、水文、地理的现象)、地球化学的循环机能(地热现象、化石燃料、非燃料矿物生成作用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资源经济学力图分析这些资源的配置问题,指出资源问题的根源,并检验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案、政策等。阿兰·兰德尔著的《资源经济学》中,把资源定义为由人类发现的有用途和有价值的物质,资源的内涵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包括空气。显然他的自然资源概念里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环境。由环境污染等引起的环境问题,将影响自然资源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环境所具有的自净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影响着自然资源的供给。还有一种情况是将环境与自然资源并列。自然资源的概念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原材料的重要来源。环境是指人类生命支持系统中除去自然资源后的所有要素,如空气、水、土地等。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在汤姆·迪滕伯格所著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中,将环境与自然资源并列。

本书将自然资源的概念中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来加以考察。

二、自然资源的分类

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最基本的划分,是根据它的更新可能性分为不可更新资源和可更新资源或不可再生资源 and 可再生资源或储存性和流动性资源两大类。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发展的时间尺度。既然所有的资源都是自然循环的产物,那么严格说来所有的资源都是可更新的,但更新的速率大不一样。^①

不可更新资源是指所有的矿藏和土地,它们是经过千百万年才形成的物资,因而从人类视角看来其当前供给是固定的,它们是单方面地流出,减少和补充没有任何相关关系,随着人类的利用而不断减少。因而,其最终可利用的数量必然存在某种极限,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极限在何处,也不知道如

① [英] 朱迪·丽丝,《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页。

果达到这个极限时所余物资是否仍可看做是资源。

可更新资源限定为那些在充分短暂的、与人类相关的时间间隔内,通过自然力能够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或不断增加流量的自然资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动物和植物、大气、水等。

可更新资源又根据是否具有自律性,分为自律更新资源和非自律更新资源。非自律更新资源是像水资源那样并不是通过资源本身的增长和繁殖来进行再生产的资源。非自律更新资源是其持续性不受人类的影响,人类每年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取决于资源本身的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现象,如太阳能,当代人消费的数量不会减少后代人消费的数量。

自律更新资源是具有自行繁殖能力的资源,通过种群的繁殖、生育和生长,资源得到不断更新,种群数量不断获得补充。如渔业资源通过产卵—孵化—稚鱼—幼鱼—成鱼—产卵等过程,进行生物性再生产,如果环境条件适宜,人类开发利用合理,渔业资源可世代繁衍,持续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但渔业资源也依赖外部太阳能所产生的基础生产力才能进行再生产,如果生长环境条件遭到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或遭到人类的酷捕滥捕,渔业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就会降低,资源减少到一定水平以下,就会失去再生能力,将会导致渔业资源得衰甚至枯竭。如果人类的管理不善,海洋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一样成为枯竭性资源。可更新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不合理利用带来的资源短缺和退化问题很可能是比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更为紧迫的问题。

对大多数可更新资源来说,天然可更新性的整个思想只是在利用水平或强度方面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对处于临界带的各种资源来说,这尤其明显。所谓临界带的所有资源都可能被掠夺到灭绝的程度。如果利用速率超过自然更新的速率,那么此类资源就可能实际上在被开采,就像任何矿产资源一样。

三、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说史考察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且要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所表现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连生产关系和生态思维,归根结底也不能不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

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当时，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人类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仅能维持个体延续和繁衍的低水平物质消费方式，人口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了很大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仍很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能基本保持相对和谐。但到了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

1. 古典经济学观点

“古典”标签确认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这一时期正是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农业生产力飞速增长的阶段。工业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

另一方面，工业化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

究竟是什么决定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自然资源通常被看作国家财富及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这一线索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土地（有时用来指总的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被认为是受限制的。当假定土地表现出报酬递减时，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经济增长是短暂的历史特征，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进入到稳定状态，而多数人的生活前景堪

忧。

这一论题与英国早期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有最密切的关系,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1978)中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以至于现在习惯上称那些对持续增长持怀疑态度的人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马尔萨斯认为,不变的土地供给,人口持续正增长趋势的假设以及农业上的报酬递减,预示着在长期中每单位资本的产出将呈现下跌趋势。按照他的说法,存在一种使人们的生活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的长期趋势。在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水平上,现状只能容许人口的再生产维持一个不变的水平,经济才能达到稳定状态。他认为,人口若不加以控制,将会以几何比例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算术比例增加,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地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斯虽然看起来是在论述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口数量要与自然资源相适应,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平衡,人口数量将会因饥荒、战争、瘟疫等灾难性、强制性的抑制而减少。

稳定状态的概念是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提出并发展的,尤其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得到具体论述。该书以能够获得小块不同质量土地的构想代替了马尔萨斯不变土地供给的假定。农业能够通过扩大内涵(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进行更加集约化的耕作)或外延(开垦更多的荒地用于生产)的方法来增大产出。然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土地投入的报酬都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经济剩余”逐渐以地租和土地报酬的方式被占用,经济最终走向马尔萨斯所谓的稳定状态。如果说马尔萨斯是“资源绝对稀缺论”观点的话,那么李嘉图则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的观点。

在约翰·斯库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处于顶峰状态的古典经济学的完整陈述。他仍然采用了报酬递减的观点,但同时更普遍地承认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及制造业的补偿作用。他指出,当时在英国,人均产出显然在增加而不是下降。考虑到由于殖民开拓获得了新的土地,矿物燃料日益得到开发以及革新使农业生产率飞速提高从而减轻了对外延界限的制约,因此他不太看重报酬递减的影响。但稳定状态的概念没有被抛弃,反而被认为是能够达到相对较高水平的物质繁荣的一种状态。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不同意马尔萨斯

的绝对稀缺论,但又坚决反对无止境地开发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极限。他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而且这一水平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失。

2. 马克思主义资源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劳动和自然界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只有自然物和劳动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种种商品,是自然界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①恩格斯指出,“其实自然界和劳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还有场所),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②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还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与劳动、资本一同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过度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平衡的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每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否则,将破坏自然生态平衡,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急功近利地破坏自然环境,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尖锐的对立中。恩格斯告诫人们:“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在其中的。”^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这些论述既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又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及其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破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还强调，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地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物质变换（代谢）”的概念，提出了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造成了大自然物质代谢中的“裂缝”严重后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人类善待自然，保护环境。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强调违背生态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对人为盘剥自然、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严厉谴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前提和相互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这种生态观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向人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4~3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